



康乃馨译丛

文学系列

eles, e bi  
o, por nome Louren  
as Adantes, e hum  
ico, e hu Clerigo.  
ay e amay donos  
ois o Day  
ente feito  
lentrão  
em nob  
molber



# 火与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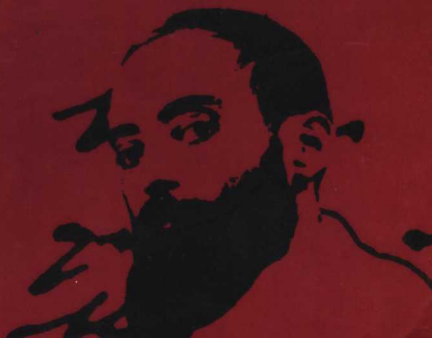
O Fogo e as Cinzas

马努埃尔·达·丰塞卡 / 著

范维信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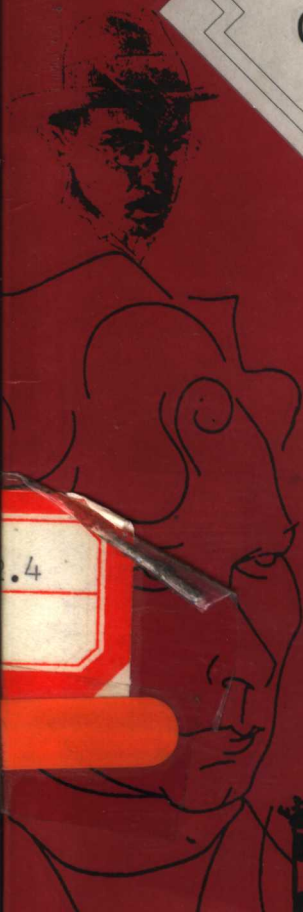
罗诗黛 / 评介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portrait.



澳门文化司署  
海南出版社

东方葡萄牙学会  
三环出版社



2552.4  
4

# 火与灰

O Fogo e as Cinzas

马努埃尔·达·丰塞卡 / 著

范维信 / 译

罗诗黛 / 评介

文化司署  
三  
环  
出  
版  
社  
东  
方  
葡  
萄  
牙  
学  
会

# 火 与 灰

(葡萄牙) 马努埃尔·达·丰塞卡

范维信 译

责任编辑：黄宪萍 顾问：余安

插图：魏惠筠

澳门文化司署 东方葡萄牙学会 出版发行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北京博诚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年11月第1版 1999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25

字数：135千字 印数：10000册

ISBN 7-80645-303-2/I·32

定价：10.00元

火  
与  
灰



评介：作家与作品

葡萄牙作家马努埃尔·达·丰塞卡 1911 年生于阿连特茹地区的圣地亚哥·多·卡森，1993 年去世。他生前出版的诗歌、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至今仍很受读者喜爱。在葡萄牙，他的短篇小说被列入葡萄牙语基础教育计划中现代文学部分的必读作品。

他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便与新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新现实主义是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至 50 年代末期盛行于葡萄牙的一个文学运动。在这一时期，国内实行的是以萨拉查为首的一党专

制,言论和集会自由得不到保障,甚至在法律上也不予规定。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条件悬殊,这在阿连特茹地区尤为明显,在这个以庄园为主的地区,许多农民过着非常贫穷甚至悲惨的生活,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儿童、老人和劳动者得不到社会保障。于是,新现实主义作家们高声呐喊,反对这种状况,揭露压迫者,要求立即进行社会变革。所以,这是个具有一定思想意识和政治动机的文学流派,也被称为社会现实主义,今天我们可以视之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马利亚·阿尔济拉·塞舒在《新现实主义作家视角中的农村小说:马努埃尔·达·丰塞卡的〈风中麦浪〉》(1993年,第86页)一文中说:“我们可以把新现实主义看作一种视角,即一种观察或展示的方式;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视角受某种理论指导(尽管其追随者们没有完全意识到或者不完全赞同这一理论)并包含着某种意图,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直接的社会意图和间接的政治意图。”在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中,我们可以提到阿尔维斯·雷多尔、马里奥·迪奥尼西奥、卡洛斯·德·奥利维拉、费尔南多·纳莫拉,当然还有马努埃尔·达·丰塞卡。“在一定意义上说,”奥斯瓦尔多·西尔韦斯特雷在《新现实主义》(1996年,第二卷,第663页)一书中写道,“新现实主义的幸运之处在于它向(几乎)所有反对萨拉查主义

的民众提供了一种与之对立的文化，这种文化在社会、政治及美学和象征性方面均结构严谨，似乎无懈可击——确实，那些与新现实主义进行较量的人总是显得苍白无力，提心吊胆，即便有人敢于正面交锋，他们的动机也不为人们所理解”。

马努埃尔·达·丰塞卡的诗集《风玫瑰》(1940)是最早的新现实主义作品之一，后来他又发表了《平原》(1941)和《诗歌全集》(1958)；他的许多诗作都描写阿连特茹农村。他还出版了一些短篇小说集：《新村庄》(1942)和《火与灰》(1951)，这两部作品都以童年时代在阿连特茹地区的经历为背景；另外还有《秋千上的天使》(1968)和《孤独时代》(1973)，在这些作品中出现了大城市和首都。他还出版了长篇小说《大山丘》(1943)和《风中麦浪》(1958)，这些作品仍然以阿连特茹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为背景。后来，他还出版了散文集《阿尔加维散记》(1986)。

在《马努埃尔·达·丰塞卡的诗作与寻找天堂》(1983年，第13页)一文中，马利亚·洛德斯·贝尔肖尔写道：“就定义而言，就现实主义诗歌即承诺诗歌。诗人创作诗歌的目的是改变历史进程；从这个角度来看，诗歌是改造社会的工具。”接着，文章作者问道：“在《风玫瑰》和《平原》两部作品里，诗歌与经历、诗歌与地理、

诗歌与意识形态是如何相互连系在一起的呢？”(第 16 页)。在该论文中,马利亚·洛德斯·贝尔肖尔提出,对这一问题应当这样回答:“就马努埃尔·达·丰塞卡而论,让诗歌创作符合意识形态理论并不以奴化诗歌为代价。也许可以把马努埃尔·达·丰塞卡的‘承诺诗歌’与那些使诗歌完全隶属于意识形态的‘遵命文学’区分开来,马努埃尔诗歌的意识形态空间界限分明;某种意识形态的基本因素似乎明白无误地在诗歌中表现无余,但是,已完成的诗作,即他的文学创作,却把诗歌从一切奴役中解放出来。”(第 34 页)。在这里,我抄录作者发表的第一本诗集《风玫瑰》中的一首,题目是《乞丐的太阳》:

请看那一无所有的乞丐,  
竟把太阳装进衣袋!  
夜幕降临,  
把太阳挂在篱笆上,  
一夜沉睡,一夜暴晒……  
早晨醒来,被阳光照得晕头转向,  
朝村落走去,  
一路大声叫嚷:  
是谁偷了我的太阳,挂在高高的天上?

几位一本正经的先生唧唧嚷嚷：  
这醉汉太荒唐！

直到夜晚，可怜的乞丐才停住嘴，  
倒在路边，  
沉睡，沉睡……

请翻开他的诗集《平原》，读一读那首《落日》。寥寥数行，把人们的孤寂和脆弱以及原野的辽阔描写得入木三分：

从山上的小窗  
露出一张惴惴不安的脸，  
向远处空旷的原野  
悄悄张望。

（是谁从远方走来？  
麦田纹丝不动，  
无风的路上，  
不见尘土飞扬……）

在长篇小说方面，马努埃尔·达·丰塞卡的杰作



□ 康乃馨译丛

首推《风中麦浪》。评论这部小说时，马利亚·阿尔济拉·塞舒在上述论文（1983年，第88—89页）中说：“在新现实主义小说中，我们认为，马努埃尔·达·丰塞卡的《风中麦浪》是该流派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的经典之作，在作品蕴含的诗意方面也是如此（我想在这里说明，这样说绝非否定他的其他作品）。”马利亚·阿尔济拉还强调指出“故事在道德方面的含意，即着力把小说的是非观念纳入为作品情节设计的环境之中——应当再次说明，是新现实主义小说把农村这一环境提到了伦理道德和美学的突出地位。”（第106页）。

这一点我在下面要提到的短篇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火与灰》是作者最得意的作品之一。马努埃尔·达·丰塞卡在前言中说，该书得以出版要感谢两位葡萄牙作家朋友，即卡洛斯·德·奥利维拉和若泽·戈麦斯·费雷拉，是他们把散见于报章杂志上的短篇小说收集起来，作家仅仅把它们按顺序排列好，起了个书名而已。

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新村庄》的序言中，作家写道：“在我最古老的回忆中充满了我最熟悉的人物和环境，我根据这些开始写一个长长的故事。”这里提到了马努埃尔·达·丰塞卡作品中的几个要素：回忆；人物和环境；一个长长的故事。

实际上，讲故事者的回忆和故事中人物的回忆交织成了他的一篇小说，成为小说中联结生活与文字的桥梁……在他的许多短篇小说中，讲故事成了回忆的同义词。有时候，回忆像在多面镜游戏中进行，讲故事者置身于另一位讲故事者的地位，而后者则在回忆往日的故事——请读一读这本书里的短篇小说《阿尔巴朗庄园的末代主人》吧。

作家在《火与灰》的序言中写道：“只有时间辨明真伪。虚构是靠过去留下来的东西进行的，它使往事具有新的生命。”回忆在故事中起着首要作用；在回忆中，回忆者和被回忆者不断转换角色，这就是回忆和捕捉对方的回忆，或者叫积极回忆，它既有再创造的功能也有重塑形象的功能。对这一点，作者在该《前言》中作了解释：“我所了解的东西不过是想象力进行创造的出发点而已。只有想象力才能发挥生活中发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并使之定型和完整起来。而只有素材才能使事实具有现实性。”马努埃尔·达·丰塞卡这些妙语仅从表面看来才荒诞不经：在文学中，想象力赋予生活以真实性……我们读一读短篇小说《证人》就能相信这一说法；作家从报纸上读到一则犯罪的消息，唯一的证人是罪犯的儿子；作家根据这点可怜的材料构思了一个真实可信、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让故事中的人物深深

扎根于其环境之中，提出他们的动机而又不加以肯定，请读者从眼前的人物中去发现罪犯。

重新编造现实、使人物有血有肉、让环境栩栩如生的能力——这里我再次引用《新村庄》前言中的话——是作家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该前言中他还指出：“在动笔之前，我长时间地对人物进行思考。这些人物曾在某一方面给我留下印象，现在他占据了我的整个身心，使我成为一个看客，留在我头脑中不肯离去，让我分担他们的苦难，共享他们的欢乐。”

苦难……作家的短篇小说中说的是什么痛苦呢？在许多情况中是受疾病和贫穷折磨的老人们的苦难，他们无力跟上时间的推移带来的变化。宣泄——在回忆中宣泄，在饮酒中宣泄，在疯狂中宣泄——成了这些人物的典型态度；由于绝望而不得不逃避，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采取自杀的方式。无依无靠的老人们身体虚弱，头脑迟钝，只得靠回忆中爆出的些须火星模模糊糊照亮遮住日光的云雾——火在灰中跳动。

但是，马努埃尔·达·丰塞卡的短篇小说也有欢乐……欢乐属于儿童，他们的童贞尚未遭环境毁坏。他们的欢乐，有爱心，有光明，有活力——在这方面请读一读《竖琴》。发生在过去，却被满怀温情摆到眼前，而且显得那么清晰。在很多情况下儿童也受到贫困的折

磨，因此同样遭受痛苦、孤独甚至死亡的熬煎。

至于青年人，他们也被孤独压得喘不过气来，生活在封闭的空间和时间之中，几乎没有任何希望，没有前途，没有目标。不过，爱情中仍然存在着力量和生命：请仔细读一读《乡野之恋》。

这就是马努埃尔·达·丰塞卡向我们讲述的各种人物。但他的短篇小说既写人物又写环境，这一点在《新村庄》一书的前言中说得一清二楚，即对（阿连特茹地区）人情地貌的怀念跃然纸上。阿连特茹位于特茹河以南，属于葡萄牙南部地区，是一片气候干燥的平原，夏季炎热；这一地区人口稀少，加之土地贫瘠和庄园制度，青年人不得不远走他乡，使老年人更加孤独无依。他讲述的故事中的景物不是人物生活的框架，而是人物真正的根。以换置法和拟人法勾画景物，使景物活起来，在许多段落中与人物溶为一体。

阿连特茹地区景物的荒凉与人物的冷漠和自暴自弃可谓“相得益彰”。作品不以人物逐渐毁坏为主题，不明确提出来或者直接加以评论，因为着重的是表现、讲述而不是总结；读者从人物的话语和感觉中了解人物。请注意，这样可以更有力、更清晰地把所描绘的世界的社会和经济方面各种弊端呈现在读者眼前。确实，马努埃尔·达·丰塞卡的短篇小说中没有宣传小册子的气

味，因为他并不直接揭露或抨击限制其人物生活的社会条件，而是通过选择人物和环境清楚地表明变革的必要性，以使人们能过上真正的生活……在小说中，他还通过尖锐的讥讽对社会和政治进行一针见血的批评。在这方面我现在仅想起一个例子，就是妙不可言的短篇小说《我们的同类》。

再回到《新村庄》一书的前言，我想强调“长长的故事”这几个字。确实，在《火与灰》、《大山丘》和《风中麦浪》中，我们仿佛在阅读一个长篇神话故事的一个个章节。阿连特茹地区农业世界的“从前”和“以后”……在有火车、电话、工厂以前；以前，是想象中的边缘模糊不清的资本主义以前的过去；以后，是非人的劳动条件，是对儿童、劳动者和老年人的漠不关心。短篇小说《广场》在一定意义上总结出他所讲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无正义可言，却又不能清楚地看到未来变革的道路。不过，在作者的短篇小说中变革也偶尔出现；作者利用一个场面、几句对话，某个人物日常生活中的片段暗示出所主张的社会结构、轮廓和前景。我们从这些司空见惯的情节中能推断出人物心灵中蕴藏着可以产生悲剧的力量和绝望——例如，短篇小说《值得回忆的半个面包》就属于这种情况，其中的人物我们可以在《风中麦浪》一书里找到。但是，在《风中麦浪》中出现的一个人

物——玛莉安娜——具有一种《火与灰》一书所缺少的精神：男女群众为实现必要的变革而集体进行斗争。

马努埃尔·达·丰塞卡的诗歌、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在内容和语言上都有相近之处。不论在诗歌还是在小说中，作家都重现他童年的阿莲特茹地区，塑造各种各样穷苦人，并把他们置于神话般的环境里。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在表达作品中人物的观点时笔触细腻，目光犀利，富于同情心，并且在许多小说中带有抒情诗韵，使我们觉得他的小说宛如散文诗。作家对（阿莲特茹地区）人民亲如兄弟的感情在他所有作品中都跃然纸上。最后，让我们重读一下《孤独》一诗中的几句：

“家乡所有的人，  
遭受欺凌和污辱的人，  
遭受酷刑的人，  
疯狂的人，  
都来吧：  
我张开双臂，  
拥抱你们！”

罗诗黛

## **Principais Obras do Autor**

### **作者的主要作品**

Aldeia, 《村子》, (1942)

Cerromaior, 《Cerromaior》, (1943)

O Fogo e as Cinzas, 《火与灰》, (1953)

Seara de Vento, 《风之原野》, (1958)

Um Anjo no Trapézio, 《秋千上的天使》, (1958)

# 火 与 灰



## 前 言

那还是遥远的1953年秋初，我在圣地亚哥住了短短的几个月之后返回里斯本，有件事让我大感惊异：一本短篇小说集编辑完毕，即将付印。这就是这本《火与灰》。为此我应当感谢卡洛斯·德·奥利维拉。

卡洛斯·德·奥利维拉以其特有的方式不让我感谢，马上说这是小事一桩，并且轻描淡写地说这是一件偶然的事情造成的，他不过是顺其自然而已。不等我追问，他便赶紧请当时在场的两位同伴作证——马丽娅·安热拉



和若泽·戈麦斯·费雷拉。

我不知道卡洛斯·德·奥利维拉是怎样设法找到这些短篇小说的。我想象不出来，因为早已把它们忘记了，当时心不在焉地不定期为报纸和杂志撰稿，既没有记录日期，也没有留下副本，并且其中一些报纸和杂志已不复存在。但是，马丽娅·安热拉以她不引人注目、泰然的微笑克服了所遇到的一切障碍，发现了那些报纸或杂志，去翻阅、去查找。

卡洛斯·德·奥利维拉还说，我也无须感谢马丽娅·安热拉和若泽·戈麦斯·费雷拉。他认为，既然这些短篇小说已经收集起来，那么此时最好的办法和唯一可行的感谢就是把它们出版。

说服我谈何容易。在出版方面，当时我正经历着一个消沉的阶段。这一阶段在《大山丘》出版后就开始了，而这部小说以题为《风玫瑰》的诗篇成为我发表前四本书的1940年至1943年那一时期的标志。那样的工作节奏和对文学的兴趣已荡然无存。仿佛经历了一场幻灭，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幻灭至今犹在。偶尔在家里或在咖啡馆里写篇把短篇小说。如果可能，当天把它卖给一家杂志或者报纸。（莫非我为此而写作？）自己既不保留副本也不记下日期。任其自然吧。我当时想，出版以后一定要保存该报纸或杂志。其结果可